

领导、追随与社群合作的集体行动

——行业协会反倾销诉讼的案例分析

朱宪辰 李玉连*

摘要 集体行动是集体性物品生产或共享资源自发治理所引发的群体性合作问题,然而治理收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搭便车”动机和行为的存在,导致集体行动实现的困难。本文通过引入异质性个体及其在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策略互动来分析可能的动态博弈均衡结果,表明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个体充当领导者、跟随者或者搭便车者的不同角色。本文利用这一理论模型解释了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事件。

关键词 集体行动, 共享资源, 异质性, 协会

一、引言

近年来,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政府先后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新农村建设”等目标,通过倡导区域性群体的合作来实现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大的制度建构如“农村合作医疗”、“合作金融”等在政府的指导和参与下组织实施,更为普遍的一些群众性自发组织诸如“社区维权”、“消防俱乐部”以及“行业协会的集体反倾销诉讼”等都属于此类群体性的合作问题。

群体性合作源于群体的共同利益,然而共同利益的存在虽然使得个体有着合作的初始意愿,但是否能够实现还取决于个体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囚徒困境”、“公地悲剧”(Hardin, 1968)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Olson, 1965)都表明了个人理性导致的集体不理性结果。因此,群体性合作的目标是提供一种“集体性物品”或者说实现群体内共享资源的自发治理,即一旦实现,对群体内每个个体都有好处,但是由于收益具有非排他性,因而个体搭便车动机始终存在,并且成为阻碍合作实现的主要因素。因此,集体行动的实现问题就是在具体的场景中分析一定规模群体中的个体通过策略互动实现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的过程,即群体内个体在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通过相互信任与合作,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如果所有个体都根据短期自利的最

*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通讯作者及地址:李玉连,江苏南京理工大学学生宿舍六区22舍213室,210094;电话:(025)84319865;E-mail:L.YL2411@sohu.com。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给予的中肯且非常有益的建议和意见。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0573046)的资助。

大化进行决策,那么搭便车行为将导致无法实现集体行动,因而在“多人囚徒困境”的场景中必然的结论是无人参与集体行动,每个人都选择“搭便车”。而现实中问题的关键在于:相比较于实现集体行动的收益而言,个体会发现短期自利的决策长期来说对自己是不利的,因而具有现实理性的个体应该努力通过合作实现集体行动。近年来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表明:在渔场、森林、牧场、水资源和许多其他共有资源方面,都存在着成功的自我治理实例。Kikuchi(1984)描述了菲律宾的某些村庄在公共灌溉系统上的集体行动。Pommeroy(1994)论述了在德国的一些社区,由全体居民共同出资防止水污染的自愿参与的集体行动现象。因此,以公地悲剧、囚徒困境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些传统的理论模型来说明集体行动不能实现是不符合现实的。

为了解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成功的集体行动实例,后期的理论解释以围绕合作个体间的相互“匹配”(Bergstrom et al., 1986)、以牙还牙的重复博弈(Axelrod and Hamilton, 1981)以及社会性合作个体的演化(Samuel and Gintis, 1998)等为代表来解释集体行动的实现问题和路径描述。¹但是这些理论仍然过于抽象地讨论集体行动问题,理论模型缺乏动态的过程性分析,因而无法应用于实际案例分析。

总之,传统的、基于理性选择模型的集体行动理论无法取得现实的说服力,正如Ruttan(2000)在点评国际公共产权大会论文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对于解释共享资源的成功治理,目前依然没有一个连贯一致的理论”,而且“过分抽象的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田野工作’的成果”。近年来,经济学家尝试构造更接近经验数据的解释模型,个体决策目标多元化以及个体之间的异质性是考察的重点内容。我们认为: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必须基于实际场景中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间的博弈互动过程来讨论均衡结果问题。由于集体行动收益的非排他性,基于同质个体间的抽象博弈分析无法取得符合现实的集体行动理论,而异质性个体的存在及其策略互动过程为集体行动的实现提供了可能,这一动态博弈过程分析是取得符合现实世界的理论解释的方向。

二、异质性与集体行动的实现:一个理论模型分析

集体行动的实现作为一种群体秩序,需要从个体行为与制度均衡的角度来探讨结果和路径问题。不同于传统的抽象分析,我们认为符合现实的理论

¹ 这一类研究集体性合作问题的学者是从个体性质差异的角度探讨人类群体性合作的实现和维持问题。主要是以人性(完全自利的经济人还是亲社会的互惠者)的演化与囚徒困境场景中合作的实现与维持的关系研究为核心。认为群体内存在一定数量的亲社会性互惠利他个体,这类个体的存在导致合作行为的发生与维持。参见Gintis(1998,2000),Fehr and Simon(1998),叶航、汪丁丁(2005)等。

模型构造必须基于如下两点：首先，集体行动是一个组织、管理、协调的动态过程，与传统的公共品自发捐赠的研究思路显著不同。² 在面临集体行动需求时，个体间需要相互联系与沟通、起草契约、组织谈判以及组建管理机构等工作，这些工作需要付出成本，而且对于集体行动的结果非常重要，这一点在传统的研究中通常被忽视。其次，理论模型必须基于个体在实际的场景中追求自身利益的策略互动过程。在现实世界的集体行动组织过程中，个体的决策总是基于对其他人行为的预期之上，虽然具有不完全的信息，但是个体在决策前总是会根据环境因素、其他人先前行为的历史信息以及其他一些标识性知识来判断个体可能的策略与行为，基于这一判断所建立的预期，个体采取对自身最有利的行为。所以，在进行集体行动的结果和路径分析时，个体的行为必须建立在相互预期的策略互动上。

根据上述要求，异质性个体的存在及其策略互动过程将成为解决集体行动难题的一个方向。虽然还没有建立较为成熟的理论模型，但是很多学者已经在文章中分析了异质性对于集体行动的影响关系，认为集体行动需要某些个体的积极领导作用。如 Johnson and Bardhan (2002) 提到，“(收入或财富) 异质性对于建立管理权威是有利的，政治地位、社会声望以及其他一些类似因素似乎是提升一些精英分子承担创建集体性规则的成本的真正动机”。Bal and Platteau (1997) 通过观察指出：“在分散决策的场景，较富的个体充当集体行动的领导角色，比如在乡村，较富的家庭通常作为共享资源管理的首倡议者并在最初发动阶段发挥积极的作用。”

总之，基于现实的集体行动分析必须以异质性个体的行为动机与策略选择为出发点，通过策略互动过程来分析可能的群体秩序结果。Kuhnert (2001) 在分析群体能否实现共同利益的集体行动时，认为“需要一个集体行动动态理论的基础，首先需要重视制度发展中企业家型个体的角色和特征，其次，制度变革领导者的动机、行为选择和能力等分析是关键”，且这是“成功的集体行动的新视角”。

概括地说，在集体行动过程中个体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个体收入、偏好以及知识等因素，而这些异质性的存在以及被个体所识别和感知使得群体内存在不同策略集的个体。本文根据这一思想，运用博弈论进行基于异质性基础上个体的动机与行为及其互动博弈能否实现自发组织的一般性分析。我们

² 实验经济学中针对公共品自发供给的研究都是基于匿名个体间的捐赠行为来进行实验设计和理论分析，这一类的分析结果无疑只能借助个体的公平感、利他等心理因素来解释。本文的讨论基于现实世界的集体行动都是一个因地缘(如乡村、社区等)或某种经济利益群体(如行业协会)内个体相识、面对面交流与讨论实施的组织过程，因而与传统捐赠研究显著不同。所以 Herzberg(2005) 在分析共享资源自发治理问题时指出，弄清楚自治与自愿捐赠行为的差别是重要的，自治意味着在制度规则制定层次的自我参与和不同的治理安排中的选择，一旦选定，自治制度对成员施以权力，一句话，自治仍是治理(Self-governance is still governance)。

认为异质性个体组成的群体进行集体行动的动态过程为:由于异质性个体的存在,形成拥有不同策略集的个体,因而导致不同的个体角色,不同角色的个体在各自策略集合的基础上进行策略互动的利益博弈,最终实现行为的稳定性。至于结果是实现集体行动还是没有实现,取决于异质性的程度所导致的具体的博弈结构。下面以一个简单的三人博弈模型分析异质性基础上的集体行动问题。

(一) 模型假设

近期,异质性个体的存在及其对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已经被一些经济学家尝试用模型进行分析,Dayton and Bardhan (2002)通过构造公共品生产函数来分析群体内个体收入分布的差异对于总产出的影响性质;Chan et al. (1999)则通过同时引入个体偏好和收入的差异进入个体效用函数的方式分析异质性对于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性质。但是到目前为止,理论模型主要还是静态分析。朱宪辰、李玉连(2006)则初步尝试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共享资源自发治理的集体行动问题,分两个阶段分别讨论了异质性和治理规则供给以及群体规范演化的关系。本文进一步利用Chan et al. (1999)的个体效用函数进行动态博弈分析,集中讨论群体自组织过程中异质性个体之间的策略互动过程,通过模型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完整地得到关于异质性差异的不同导致的几种不同均衡结果,不但明确了集体行动过程中领导者与跟随者角色的实现机制,同时也得到无法实现集体行动自组织的理论解释,使得理论模型更加符合现实世界的集体行动发生、实施和维持的过程,更具现实说服力。遵循朱宪辰、李玉连(2006),我们的模型作如下假设。

1. 群体由三个人组成, w_i 表示个体各自的收入,个体收入是外生给定的约束变量。

2. 除了个体间私人物品的获取与消费互相独立以外,群体内部还可以通过合作实现集体性物品的供给和消费。令 G 表示集体性物品的产出, $G = \sum_i g_i$, g_i 为个体的投入量,与私人物品消费是替代关系,即 $g_i + x_i = w_i$, x_i 代表私人物品消费量。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每个人的集体性物品生产的投入需求皆为 g 。即个体的参与决策为:要么供给为 g ,要么供给为0,即搭便车。

3. 个体效用是私人物品消费 x_i 和集体性物品消费 G 的总和。我们假定个体效用函数形式为: $u_i = u(x_i, G) = x_i + \alpha_i G + x_i G$ 。其中,参数 α_i 用以表征个体的偏好差异。

从效用函数中可以看出,除了传统上个体收入的外生差异,采用这样的效用函数形式表明集体性物品对于不同的个体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因而将偏好差异引入到个体决策和行为选择中(Chan et al., 1999)。同时,集体性

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消费是互补的³，且因为集体性物品的供给能够同时增加其他人的效用，因此，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具有正的外部性。

4. 实现集体性物品的生产需要一定的组织成本⁴，表示为在群体内进行联系与沟通工作、收集信息、起草契约以及组织谈判等初期的固定投入， c 一旦投入则为沉没成本。

(二) 个体行为与制度均衡结果

我们在个体偏好 α_i 和收入 w_i 存在差异的条件下来分析集体性物品供给的博弈过程和可能的结果。⁵ 根据我们的博弈场景和过程描述，每个个体的战略集合为（组织、参与），（组织、不参与），（不组织、参与），（不组织、不参与）；在现实中，一个理性个体的行为选择总是根据选择某种行为的收益与不选择的收益比较来进行决策的。我们首先不考虑具体的个体来分析个体的组织与跟随参与决策的选择问题。

首先我们来分析个体是否选择组织的行为策略。根据我们的模型假设，通过集体行动实现集体性物品的供给首先需要组织，由于组织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因此，个体选择组织还是不组织是由各自行为的收益决定的。对于每一个个体 i 来说，不组织，从而无法实现集体性物品供给的情况下收益为 w_i ；在组织的情况下，其余两个人都跟随参与的收益是： $w_i - g + \alpha_i 3g + (w_i - g) 3g - c$ ；只有一个人跟随参与的收益是： $w_i - g + \alpha_i 2g + (w_i - g) 2g - c$ ；其余两人都不跟随参与情况下的收益是： $w_i - g + \alpha_i g + (w_i - g) g - c$ 。

因此，在缺乏其他人效用值信息，也即无法确定是否会有个体跟随参与的情况下，个体 i 选择组织集体行动的条件需要满足：

$$w_i - g + \alpha_i g + (w_i - g) g - c > w_i,$$

即 $\alpha_i + w_i > \frac{c}{g} + g + 1$ 。所以我们有命题 1。

命题 1 在集体行动的组织决策中，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效用信息，需要满足 $\alpha_i + w_i > \frac{c}{g} + g + 1$ ， $i=1, 2$ 或 3 ，个体 i 才会考虑承担组织成本进行组织。

³ 效用函数中的 $x_i G$ 项表明私人物品与集体性物品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关系。这一处理形式是为了符合现实世界个体在对待集体性物品与私人物品消费的不同，主要与私人物品大多是物质性消费，而集体性物品则涉及共同消费以及诸如心理愉悦等非物质性消费有关，所以两者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关系。参见 Chan et al. (1999)。

⁴ 张曙光 (1992) 区分了制度变革成本（建立一种制度或制度结构必须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类似于工程开办费和建设费的一次性开支）和制度运行成本，认为两者应该区分开来。本文把集体行动纳入制度培育与变迁的框架，因而这里的组织成本可看作制度变革成本；同时，本文忽略运行成本对于初期决策的影响。

⁵ 为了模型的简化，我们只考虑了偏好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没有考虑知识等其他因素，根据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将其他因素纳入模型，比如考虑知识的差异造成组织成本的不同。本文为了一般性的说明问题做了简化。

否则,个体就不会参与集体行动的组织。

同样,每一个个体选择是否跟随参与的决策也是建立在各自行为的收益比较上。假设已经有人进行组织的情况下,那么对于其余两人中任意一个个体 i 进行是否跟随参与的决策选择来说,如果预期只有一个人组织和参与,个体 i 不跟随参与的条件是:

$$w_i - g + \alpha_i 2g + (w_i - g)2g < w_i + \alpha_i g + w_i g, \quad \text{即} \quad \alpha_i + w_i < 2g + 1.$$

如果是预期两个人参与的情况下,个体 i 仍然选择不跟随参与的条件是:

$$w_i - g + \alpha_i 3g + (w_i - g)3g < w_i + \alpha_i 2g + w_i 2g, \quad \text{即} \quad \alpha_i + w_i < 3g + 1.$$

可见,在已经有个体进行集体行动组织的情况下,其余两个个体在不确定总的参与人数的条件下,任意一个个体选择不参与的行为是上述两个条件取交集,即 $\alpha_i + w_i < 2g + 1$ 。于是我们得到命题 2。

命题 2 在已经有个体进行组织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其他人效用的信息,需要至少满足 $\alpha_i + w_i > 2g + 1$, $i = 1$ 或 2 , 个体才会选择跟随参与,否则只会选择搭便车行为。

命题 1 和命题 2 分别针对集体行动中组织和跟随参与的决策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虽然个体的效用函数中包含偏好和收入差异,但事实上还没有确切地根据这些差异进行实际的博弈互动分析。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决策和行为选择中,每个个体会根据自身偏好和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其他信息基础上的行为预期形成不同的策略集,也就是是否选择组织以及跟随参与的行为决策,因而可能充当不同的角色。在 Bardhan and Ghatak (2006) 的模型中,预先假设了 $w_1 > w_2 > w_3 > \dots > w_n$ 的一个降序排列。同样,为了简化和直观地分析集体行动的不同结果,我们假设存在 $\alpha_1 + w_1 > \alpha_2 + w_2 > \alpha_3 + w_3$ 。而且我们认为,基于群体生活的历史信息,个体的偏好和收入以及效用函数是三人的共同知识。在这里,由于效用函数的一致性,且存在条件 $\alpha_1 + w_1 > \alpha_2 + w_2 > \alpha_3 + w_3$, 所以,无论最终实现的集体性物品供给量是多少,个体 1 能够获得的效用最大,且这是三人的共同知识。根据命题 1,在无法确定其余人是否会跟随的条件下, $\alpha_i + w_i$ 越大越有可能成为组织者。因此,个体 1 因而最有可能成为组织和领导者。由于 $\alpha_2 + w_2 > \alpha_3 + w_3$, 根据命题 2,个体 2 比个体 1 更可能成为跟随参与者。朱宪辰、李玉连 (2006) 虽然给出了如图 1 的三人博弈结构,但是缺乏先验降序排列的假设。本文此处的详细分析进一步地清楚表明,集体行动可以用一个序贯博弈来表示动态博弈过程(见图 1)。

因此,在由三个个体组成的群体面临集体性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场景中,在个体效用是共同知识基础上的博弈互动能够导致集体行动参与人数或者说集体性物品供给总量的几种不同结果。结合图 1,根据命题 1 和命题 2,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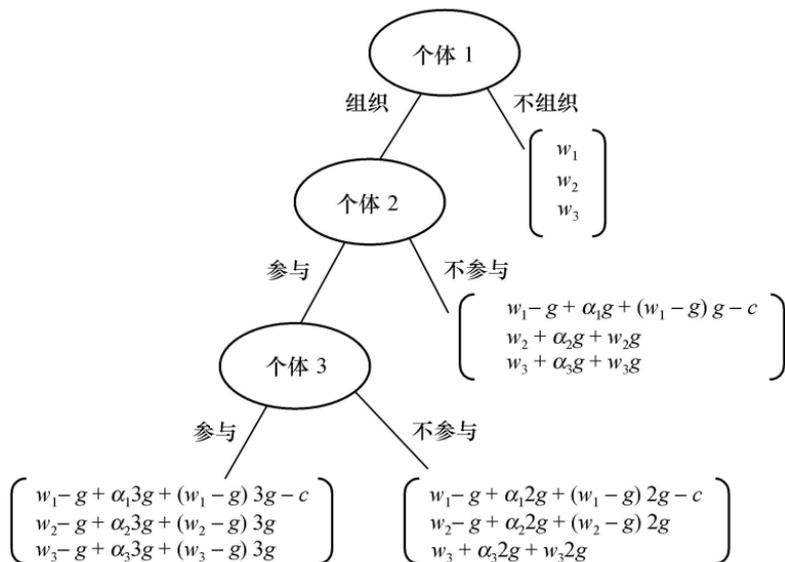


图 1 三人集体行动博弈 (括号内依次为个体的效用)

$\alpha_2 + w_2 < 2g + 1$ ，同时 $\alpha_1 + w_1 < \frac{c}{g} + g + 1$ ，则一旦个体 1 组织，个体 2 和 3 都会选择搭便车，预期到这一结果，个体 1 不会组织。因此结果只能是无人组织也无人参与，集体行动无法实现。当然，若满足 $\alpha_2 + w_2 < 2g + 1$ 且 $\alpha_1 + w_1 > \frac{c}{g} + g + 1$ ，那么个体 1 独自组织实现集体物品的供给 g 。

结论 1 在三人且各自的效用是共同知识的集体行动中，在满足 $\alpha_2 + w_2 < 2g + 1$ 的条件下，若 $\alpha_1 + w_1 < \frac{c}{g} + g + 1$ ，则无人承担集体行动组织的初始成本，三个个体都选择搭便车，实现的集体性物品为 0；若 $\alpha_1 + w_1 > \frac{c}{g} + g + 1$ ，那么个体 1 独自组织和参与，实现的集体性物品为 g 。

结论 1 实际上表明，在偏好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的条件下，同样的集体性物品产出，获得效用最大的个体通常最有可能成为组织者，其他人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是否搭便车。由于一人供给的情况属于“智猪博弈”的结果，因而尽管现实中也存在相当的案例，而且从结果上来看也实现了一定量的集体性物品的供给，但是由于参与人数太少，不应当再归结于集体行动的实现，因而对于研究通过集体行动实现集体性物品供给来说不具有普遍意义。

根据图 1 和命题 2，不论个体 3 如何选择，一旦个体 1 组织集体行动，那么在满足 $2g + 1 < \alpha_2 + w_2$ 的条件下，个体 2 选择跟随参与对自己是有利的，而预期到这一情况，只要满足 2 参与的情况下个体 1 的收益超过不组织，即 $w_1 - g + \alpha_1 2g + (w_1 - g)2g - c > w_1 \Rightarrow \alpha_1 + w_1 > \frac{c}{2g} + g + 1/2$ ，个体 1 就

会选择组织集体行动。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个体1组织和参与,个体2跟随参与)构成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根据图1,在个体1组织和个体2参与的情况下,个体3参与还需要满足: $w_3 - g + \alpha_3 3g + (w_3 - g)3g > w_3 + \alpha_3 2g + w_3 2g$,即 $\alpha_3 + w_3 > 3g + 1$ 。由于 $\alpha_2 + w_2 > \alpha_3 + w_3$ 。所以实际上是 $\alpha_2 + w_2 > \alpha_3 + w_3 > 3g + 1$ 。而一旦满足个体3参与的条件,则个体1预期到个体3能够参与的情况下,个体1组织并参与的条件变为: $w_1 - g + \alpha_1 3g + (w_1 - g)3g - c > w_1$,即 $\alpha_1 + w_1 > \frac{c}{3g} + g + \frac{1}{3}$ 。所以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2 在三人且各自的效用是共同知识的集体行动中,满足 $\alpha_3 + w_3 < 3g + 1$, $2g + 1 < \alpha_2 + w_2$,且 $\frac{c}{2g} + g + \frac{1}{2} < \alpha_1 + w_1$ 的条件下,个体1付出成本组织集体行动,个体2跟随参与,个体3搭便车,实现的集体性物品总量为 $2g$ 。

结论3 在三人且各自的效用是共同知识的集体行动中,若 $\alpha_2 + w_2 > \alpha_3 + w_3 > 3g + 1$,且 $\alpha_1 + w_1 > \frac{c}{3g} + g + \frac{1}{3}$,那么,个体1付出成本组织集体行动,其余两人都会选择跟随参与,实现的集体性物品总量为 $3g$ 。

结论2和3表明,在预期到存在跟随参与者的条件下,个体1主动承担组织成本的条件就会降低,换句话说,组织者角色更容易实现。因为对于组织者来说,有人跟随参与的情况下自己的成本不变,但集体性物品供给的总量增加了,因而效用增加。

在现实生活中,集体行动的实现路径实际上存在两个阶段,首先是发起阶段,需要某些个体承担沟通与联系、组织谈判以及建立相应组织机构等集体行动的前期准备工作。我们的模型表明:由于异质性的存在,某些个体将自发承担这些工作的成本以组织和实现集体行动。而在其后的实施和维持阶段,主要是群体内其他个体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跟随或者搭便车行为。应用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可以一般化地解释现实中集体行动的实现路径与结果:一部分人积极组织,一部分人跟随组织者参与,而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始终搭便车。我们可以由此把群体内个体划分为相应的角色或类型:领导者、追随者和搭便车者。⁶在结

⁶ 需要特别指出:不同的角色或类型是根据个体异质性基础上的策略集决定的,而不是先天预设的,这一点在模型中体现的很清楚。关于在集体行动中引入不同类型行动者及其划分参见 Wallis et al. (2002),但是该文主要是通过预先设定的阈值条件进行个体类型划分,即考虑存在资源和偏好差异,并设 R^* 和 I^* 为各自的阈值条件。然后根据 $R < R^*$ 和 $R > R^*$ 以及 $I > I^*$ 和 $I < I^*$ 来划分,将参与者划分为:激进者、主导者、搭便车者以及跟随者四类。然后的处理是将不同类个体进行匹配分析,得到个体比例与集体行动结果的关系。这与本文个体角色内生性的理论思路和模型存在不同。相类似的角色划分还有诺斯(1990)提出的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概念和相应的作用。

论 1 的情况下，搭便车行为将是普遍的，要么群体内将无人承担领导者角色，大家都“观望”，希望有人带头组织，但实际上无人组织，要么极少数个体组织和参与，因而这一类群体通常无法实现成功的或者说较多参与的集体行动。从结论 2 和 3 可以看出，在满足相应的异质性条件下，为了通过集体行动获得更大的收益，某些个体会首先站出来进行组织与协调等工作，群体内的博弈互动可能实现较多数甚至是一致的参与。

总之，将集体行动纳入异质性个体间策略互动的动态过程来考察，首先是分析基于异质性基础上个体的动机与行为，现实中的个体基于自身利益和其他人的一些判断形成不同的策略集，基于这一策略集决定个体自身在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个体间不同的策略集的互动博弈导致不同的博弈均衡结果。因为建立管理机构、通过谈判建立规章以及信息沟通等都需要成本投入，而且未来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因而能否实现自组织的集体行动需要某些个体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由于现实生活中个体之间异质性是普遍存在的，本文的模型表明正是这些异质性导致个体在集体行动的发育和实现过程中起到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异质性基础上的策略互动过程导致不同的集体行动结果。⁷

三、反倾销诉讼的一个集体行动案例分析

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事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它是中国正式加入 WTO 之后遭受的第一起反倾销诉讼；第二，这也是国内第一次由行业协会这种民间组织成功实现自发组织与合作来应对国外的反倾销事件。因此国内许多学者围绕成功组织反倾销诉讼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展开了探讨。一部分学者是围绕行业协会发挥的中坚作用来分析的，而本文则跟随大多数学者的分析思路，认为企业间合作的反倾销诉讼是一个集体行动问题。由于通过组织集体行动实现群体有益的结果在现实中面临普遍的需求，因而分析这一案例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整个事件的简要经过是：2002 年 6 月 28 日，欧盟在欧共体的《官方公报》上发出公告，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包括一次性打火机、金属外壳打火机和汽油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按照 WTO 的规定，反倾销所涉及的出口商必须在 15 天内作出应诉反应，否则将视作自动放弃。由于行业内部意见难以统一，在应诉有效期内的近十天时间里，各个企业相互观

⁷ 在已有的关于异质性与集体行动关系的研究文献中，除了异质性与集体行动存在正或负的影响性质，还存在 U 型关系的描述。虽然缺乏正式的理论模型，但是已有实证研究在验证该关系，并只得到了微弱的支持，参见 Dayton and Bardhan(2002)。关于异质性的准确度量以及与集体行动的影响性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望,都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7月5日,温州烟具协会会同同样涉案的宁波和广东的打火机生产商一道在温州举行了打火机反倾销应诉会议。当晚,该协会理事会召集理事会会员会议,经过连夜商讨,理事会决定,筹资聘请律师,组织16家企业应诉。在律师的建议下,15家企业提出无损害抗辩,东方打火机公司申请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在收到温州应诉打火机企业的调查表答复之后,于2002年9月和12月两次进行现场调查。第一次主要针对应诉企业的财务、销售和成本等所有账目进行详细调查。不久,欧盟正式承认东方打火机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待遇。第二次在提出无损害抗辩的15家企业中抽查了3家,对金属外壳打火机的设计开发、使用材料、结构功能、生产工艺、销售渠道、销售价位、终端市场和消费者使用心理等方面做了细致调查。2003年7月14日,起诉方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致函欧盟委员会,要求撤回反倾销申诉。根据欧盟的反倾销法规,一旦申请方撤诉,反倾销程序将被终止。7月17日,欧盟方面决定终止反倾销调查程序,并将此决定致函中方代理律师。此后,在欧盟规定的10天陈述期内,没有人对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回反倾销申诉表示异议,这起“洋官司”至此自动终结。

虽然表面上看集体的反倾销诉讼是通过行业协会发挥的组织作用,但本质上这个案例是一个集体行动问题。因为行业协会虽然能够通过促进企业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的声誉等促进合作,但是协会本身其实是一个自愿合作组织,是由加入协会的各个打火机及相关产品生产商所自愿形成的一个集体。面对反倾销诉讼,行业协会并不能实施强制性权力来要求企业参与,因而能否成功实现反倾销诉讼的集体行动取决于企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决策和行为选择。在整个事件的进程中,我们没有看到协会能够实施强制力来统一规定企业分摊实现应诉的成本份额;相反,由于每个企业都希望别的企业承担成本去应对反倾销诉讼,而自己只享受应诉成功的好处,因此,观望、等待在事件最初阶段是企业普遍的心态。当然,企业也会认识到都不参与应诉的损失,因此,这是一个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集体行动问题的性质使得每个企业都存在搭便车的动机,所以媒体的语言这样描述:“打官司,就要请律师,但请律师的费用谁来出?刚刚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面,在开始启动为打官司筹款时,参会的二十多人却僵持下来,谁也不肯第一个掏腰包”。因此,尽管早已获得欧盟可能进行反倾销立案的信息,温州的众多打火机企业在面对立案通知时,仍然显得不知所措。由于搭便车动机的存在,在应诉有效期内的近十天时间里,各个企业相互观望,都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事实上,最终参与应诉的只是16家企业,而协会共有两千多家会员。可见,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是一个集体行动实现的案例。

由此本文试图分析的问题是,反倾销诉讼集体行动实现的机制与路径。我们分析的基本方法建立在理性的个体基于对自身的成本收益考虑而作出的行为选择上,运用前面的理论模型,我们来解释这一案例中经过10天的观望

期，最终两千多家会员企业中有 16 家规模较大的企业采取应诉行动这一情况。在我们前面的理论模型中，是将集体行动纳入异质性个体间的策略互动的动态过程来考察，也就是说，每一个企业都能够认识到不实现集体的反倾销诉讼带来的损失，因而每一个企业都存在合作的初始动机。同时，为了实现反倾销诉讼的成功，企业间应该设法通过协调和组织实现集体行动。下面我们利用理论模型来分析这一次成功的集体行动。

反倾销诉讼集体行动的组织与实现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组织、发动与实施、维持。这两个阶段表现为存在两类主要的集体行动角色：领导者和跟随者。根据我们前面的模型，在组织与发动阶段，基于历史信息和其他的一些信号标识，在自身收益和其他人行为的判断基础上，必然是某些个体自发充当领导者和组织者。在这里，主要是基于应诉成功的收益大小，也就是企业规模和出口量来决定个体的角色。整个的博弈互动过程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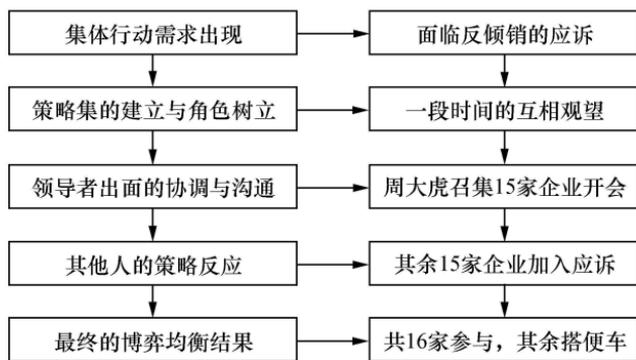


图 2 集体行动的动态过程和阶段

在本案例中，应当是协会主席周大虎充当领导者这一角色，在组织和发动阶段开展联系、交流和组织工作。周大虎的行为选择是在组织还是不组织之间作出的。不组织当然是遭受企业的损失，组织的收益预期在于能否实现其他一些企业的跟随参与，从而分摊应诉成本、提高成功应诉的概率。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现实场景中，周大虎无疑认识到了自己必须充当的角色。在我们前面的模型中，如果说存在 $\alpha_1 + \omega_1 > \alpha_2 + \omega_2 > \alpha_3 + \omega_3 \dots$ 的先验序列，那么，作为协会主席以及占据最大产量的周大虎无疑就是表征为 $\alpha_1 + \omega_1$ 的个体。事实上，温州年出口 5 亿只打火机，销售额为 30 亿—40 亿元。而周大虎的公司年产打火机约 1500 万只，价值在 2 亿元左右。在本案例中，周大虎显然满足命题 1 中 $\alpha_i + \omega_i < \frac{c}{g} + g + 1$ 条件，也就是周大虎独自应诉是不划算的，事实上，正因为此，本案例才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在绝大多数的场景中，集体行动实现的结果要求较多数的参与。在这里，有关企业各自产量或者说应诉成功后的收益作为共同知识，显然，周大虎能够认识到若想成功地组织集体应诉自己必须充当的角色，其他人也同样预期到这一结果。因此，

在这一次成功的集体行动的发起阶段,协会主席周大虎认识到“不打国际官司只能等死”这一结局,将部分协会成员召集到一起,共同商讨对策来实现集体性应诉。并且在具体讨论集资请律师等问题时,面对众人的沉默,又是协会主席周大虎首先挺身而出,“没办法,我是会长,我必须带这个头,我捐10万!”可见,在这一集体行动的实现过程中,在发起阶段领导者个体的存在并且发挥带头组织、协调等管理工作是首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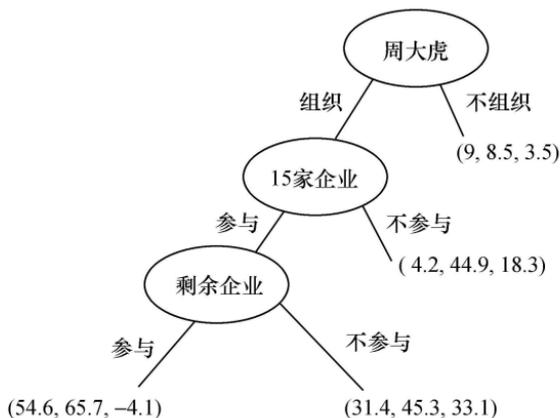
其次,在实施和维持阶段必须存在一定量的跟随企业,这些跟随者的存在成为集体行动最终实现的关键力量。在现实的策略互动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强调领导者基于对其他人的预期,认为自己带头组织以后能够实现一部分人的跟随参与,从而实现组织的收益大于不组织,因此,领导者才能主动成为领导者。另一方面,从其他人自身收益的角度,跟随者之所以成为跟随者也是因为跟随参与的收益大于不跟随。在本案例中,在周大虎的劝说下,一些企业认识到不合作应诉的严重后果,积极予以响应。最终共有其他15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参与进来共同应诉,且“大家当场捐款三百多万元”。根据我们前面的模型,若把15家看作一个整体,用 $\alpha_2 + \omega_2$ 表示,那么这些参与者满足 $2g + 1 < \alpha_2 + \omega_2$ 的条件,也就是模型中结论2成立。

此外,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群体的异质性程度决定了群体中搭便车的比例,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条件下,收益较大的个体组织参与或者跟随参与,而收益较小的企业选择搭便车。本案例中,在行业协会有两千多家成员企业的情况下,除了16家参与应诉,其他规模较小的企业都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了搭便车。也就是结论2中满足 $\alpha_3 + \omega_3 < 3g + 1$ 条件下,这些小企业在上述16家共同捐款应诉的情况下选择搭便车,而不是也捐款。

这一次反倾销应诉集体行动的动态博弈过程和结果可以用图3简明地看出。我们令 $\omega_1 = 9$, $\omega_2 = 8.5$, $\omega_3 = 3.5$, $\alpha_1 = 0.8$, $\alpha_2 = 0.6$, $\alpha_3 = 0.2$, $g = 4$ ⁸, $C = 20$, 将其分别代入图1中,就能够得到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出,只要周大虎出来组织,即使其他大多数企业不参与,在有15家企业参与的情况下,这15家企业的参与收益45.3大于不参与收益44.9,因此这15家企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会选择跟随参与,也就是案例中在周大虎的带头下参与捐款的结果。而周大虎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即有15家跟随的情况下能够实现收益31.4,大于不组织的收益9,因此才主动站出来组织。可见,(周大虎组织,15家企业跟随参与)构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而

⁸ 与其他现实中的案例一样,通常存在每个个体在集体行动中投入的成本不相同的情况。在本案例中,很明显各个协会成员由于生产规模或者说出口量的不同捐出的钱也会不同。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异质性与集体行动实现的关系,因而理论模型以及此处的博弈结构的处理是一种简化。事实上,组织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个体之间达成关于各自所需投入成本的契约性规则,因此对于集体行动来说,重要的是首先需要组织。当然,实际的投入分摊也是具体案例的详细分析中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本文的简化处理不影响问题的实质。



其他小企业因为参与的收益小于不参与的收益，因而选择搭便车。

总之，在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事件中，集体行动的实现机制是依靠规模存在差异的企业之间的动态博弈，实现的具体路径是：规模最大的企业，即周大虎充当领导者，组织、协调和管理整个反倾销应诉；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跟随参与，在本案例中是其余 15 家规模较大的企业；除了这 16 家企业以外，协会两千多家企业中其余的小企业则选择搭便车。⁹ 因此，在现实世界面临同样的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群体利益的需求时，某些行为主体需要认识到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础上进行的积极领导和组织工作，同时，集体行动实现带来的收益较少者也要积极地跟随参与，两类角色的合作共同实现和维持集体行动。

四、结 论

集体行动是集体性物品生产或共享资源自发治理所引发的群体性合作问题。集体性物品或共享资源构成特定群体的共同利益，引发集体行动的需求，然而收益的非排它性决定了“搭便车”动机和行为，导致集体行动实现的困难。传统的、基于同质经济人假设的集体行动理论过于抽象地讨论问题，理论模型缺乏动态的过程性分析，因而无法取得现实的说服力。

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集体行动是一个基于群体内可以面对面交流的场景，而并非传统研究的“匿名”个体间的“自愿捐赠”场景，即面临集体行动行为选择的个体不是处于隔离的、被分别关在黑屋子中的“囚徒”，而要么是具

⁹ 当然，现实世界的集体行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存在其他一些相关的因素影响集体行动的组织过程和结果。在反倾销诉讼中，国外的法律以及事件本身决定了胜诉的可能性，而这当然影响能否组织实现应诉的集体行动。此外，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等因素也是重要的。本文的理论模型和案例分析集中围绕个体间以效用为核心的博弈互动过程与集体行动实现的关系，因而对上述因素没有作扩展分析。

有地缘关系的群体,如乡村、城市小区,要么是具有经济或者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如行业协会成员、校友会等,总之是可以面对面沟通、交流、谈判的。因而集体行动的实现是一个建立在相识或者说存在面对面讨论和交流基础上的群体性自组织问题。本文的理论模型首先是分析基于异质性基础上个体的动机与行为,个体基于自身利益和其他人的行为预期形成不同的策略集,从而决定了个体在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因为信息沟通、谈判制定规章以及建立管理机构等都需要成本投入。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的集体行动实现路径中,实际上存在两个阶段:组织、发动与实施、维持。这两个阶段表现为两类主要的角色:领导者和跟随者。我们的模型表明:由于异质性的存在,某些个体将承担发起工作的成本以组织和实现集体行动,而在后一阶段则是群体内其他个体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跟随参与或者搭便车。

在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事件中,集体行动的实现机制是依靠规模存在差异的企业之间的动态博弈,实现的结果和路径是:规模最大的企业,即周大虎充当领导者,组织、协调和管理整个反倾销应诉;规模较大的其他15家企业跟随参与,其他众多小企业选择搭便车。由于现实世界中类似于集体反倾销应诉的集体性物品的供给或者共享资源的治理需求是普遍存在的,因而这一类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我们在理解异质性与集体行动实现关系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予以应用,从而能够实现较多甚至普遍参与的集体行动,实现更多集体性物品同时促进社会的和谐和持续发展。我们的理论模型对于解释这一集体行动的成功组织具有很好的现实说服力,从而初步实现了集体行动理论与现实分析的结合,并且为今后进一步分析其他一些群体性合作问题打开了新的视角。

参 考 文 献

-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 [2] 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
- [3] Axelrod, R. and W. D. Hamilton,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Science*, 1981, 211, 1390—1396.
- [4] Baland, J. M. and J. P. Platteau, "Wealth Inequality and Efficiency on the Commons-Part I: the Unregulated Cas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7, 49(3), 451—482.
- [5] Bardhan, P. and M., Ghatak, "Wealth Inequal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BREAD Working Paper, No113, January, 2006.
- [6] Bergstrom, T., L. Blume and H. Varian, "On the Privat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6, 29(1), 25—49.
- [7] Chan, K. S., S. Mestelman, R. Moir and R. A. Muller, "Heterogeneity and 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1999, 2, 5—30.
- [8] Chan, K. S., R. Godby, S. Mestelman and R. A. Muller, "Spite, Guilt, and 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When Income Is Not Distributed Equall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29(1), 605—609.

- [9] Fehr, P. and G. Simon, "Reciprocity and Economics: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Homo Reciproca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8, 42(3), 845—859.
- [10] Gaspart, F. and J. P. Platteau, "Heterogene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for Effort Regulation: Lesson from the Senegalese Small-scale Fishe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2, 57(2), 189—197.
- [11] Gintis, H., "The Human Actor in Ecological-economic models, beyond Homo-economicus: Evidence from Experimental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8, 35, 311—322.
- [12] Gintis, H., "Strong Reciprocity and Human Socialit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000, 206, 169—179.
- [13]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968, 162, 1243—1248.
- [14] Herzberg, R., "Commentary on Richard Wagner's 'Self-governance, Polycentrism, and Federalism: Recurring Themes in Vincent Ostrom's Scholarly Oeuvr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5, 57(2), 189—197.
- [15] 黄少卿、余晖, "民间商会的集体行动机制——对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的案例分折",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年第 4 期, 第 66—73 页。
- [16] Johnson, D. and P. Bardhan, "Inequality and Conservation on the Local Commons: A Theoretical Exercise", *Economic Journal*, 2002, 112(481), 577—602.
- [17] Kikuchi, P., "Economics of Community Work Programs: A Communal Irrigation Projects in the Philippin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84, 26(1), 211—225.
- [18] Kuhnert, S.,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Common Good",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1, 12(1), 13—29.
- [19] Platteau, J. P., "Coordination Problems in Resource Conservation Progra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7, 53(2), 197—210.
- [20] Pommerene, W., and H. Feld, "Voluntary Provision of A Public Good: Result from A Real World Experiment", *Kyklos*, 1994, 47(2), 505—518.
- [21] 青木昌彦著, 周黎安译, 《比较制度分析》。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
- [22] Ruttan, H., "Book Review of 'A Rice Village Saga: Three Decades of Green Revolution in the Philippines, by Yujiro Hayami and Masao Kikuchi'",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2, 50(2), 460—463.
- [23] Samuel, B. and H. Gintis, "The Moral Economy of Community: Structured Popu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Prosocial Norms",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1998, 19(1), 3—25.
- [24] Wallis, J., B. Dollery and H. C. Mun, "Leadership and Economic Theory", Working Paper Series in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School of Economics, No. 11, 2002.
- [25] 席小炎, "论我国行业协会在反倾销应诉中的作用——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洲打火机反倾销案例分析", 《江西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4 期, 第 49—56 页。
- [26] 叶航、汪丁丁, "利他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经济学家》, 2005 年第 3 期, 第 46—53 页。
- [27] 张曙光, 《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 [28] 朱宪辰、李玉连, "异质性与共享资源的自发治理——关于群体性合作的现实路径研究", 《经济评论》, 2006 年第 6 期。

Leaders, Followers and Collective Actions in Communal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n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ti-dumping Lawsuits

XIANCHEN ZHU YULIAN LI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ollective action is called upon for communal cooperation in supplying collective goods or governing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 Because all the actors have the incentive to free-ride due to the non-exclusiveness of the benefits,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individual heterogeneities and uses a model to analyze individual strategy and equilibrium behavior. Individual actors choose among three roles in the course of collective action: a leader, a follower, or a free-rider. We use this model to analyze a recent anti-dumping lawsuit in Wenzhou.

JEL Classification D73, H41, P35